

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王
曼
曼
长
夜
中

张
瑞
麟
回
忆

在漫漫长夜中

张瑞麟回忆录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张瑞麟回忆录

在漫漫长夜中

封面题签：陈 雷
责任编辑：刘文新
封面设计：张乙迪

在漫漫长夜中

Zài Mǎnmǎn Cháng Yè Zhōng

张瑞麟回忆 张 静整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6 10/16·插页 3·字数 124,000

1985 年 1 月第 1 版 198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500

统一书号：11093·147

定价：1.10 元

编者的话

为了收集、积累、保存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方面的资料，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参考；为了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教材，我们特请一些革命老同志，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编辑出版一套“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从一九八四年开始陆续出版。现在即将出版的《在漫漫长夜中》，是原东北地下党和东北抗联老同志张瑞麟的革命斗争回忆录。

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同撰写其他党史资料文章一样，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尊重历史事实，要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一个人的革命斗争实践有限、见闻有限、记忆有限，在某些情节上有误，在某些事实上需要补充，在某些见解上值得商榷，则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所以，本丛书同读者见面之后，热情欢迎有关同志提出意见，写出补充，以印证、鉴定史实，交流看法，促进史料的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更欢迎广大读者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

717 82/20

目 录

| | |
|-----------------------|-----|
| 开头的話 | 1 |
| 踏上革命征途 | |
| ——烟筒山伪军追击炮连起义前后 | 3 |
| 在漫漫长夜中 | |
| ——哈尔滨地下斗争的艰苦岁月 | 24 |
| 在虎口中周旋 | |
| ——改编“庄稼人”匪队 | 66 |
| 转战在松花江畔 | |
| ——十二支队攻克肇源的前前后后 | 88 |
| 历经艰险的三年转战 | 117 |
| 再历艰险寻找于天放同志 | 149 |
| 为建设新政权而斗争 | 169 |
| 结束语 | 206 |
| 后记 | 207 |

开头的 话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三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殉国四十周年纪念日。应中共靖宇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邀请，受中共黑龙江省委和全省人民的委托，我带领黑龙江省代表团，前往参加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作为从南满开始踏上革命征途，在参加革命最初的岁月里，曾经跟随杨靖宇将军战斗过的原南满游击队的老战士，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参谒将军殉国的地方，缅怀先烈的英雄业绩，实为难得，弥足珍贵。

从靖宇县归来的途中，我有意回到了阔别四十七年的磐石县烟筒山镇。那里是我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同曹国安、宋占祥（又名孙铁岩）同志组织伪铁道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起义的地方，也是我踏上革命征途后参加第一次重要革命活动的地方。旧地重游，倍感亲切，追思往事，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几十年来的革命经历一幕幕重新浮现在眼前：从四十七年前参与发动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开始，先后经历了在白色恐怖下的哈尔滨的八年地下斗争；深入虎穴，争取“庄稼人”匪队投入抗日队伍；转战松江之滨，胜利攻克肇源；向中苏边

境地帯长达三年的艰苦转战；冒险从苏联重返祖国寻找于天放同志；为建设人民的新政权而斗争等战斗历程，恍如昨日。

出于对过去的革命岁月的珍重，对革命烈士的深切悼念，对千千万万东北抗联的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也试图为人们提供一个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史的侧面，我把自己在革命道路上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记述下来，呈现在读者面前。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我在记述中力求做到真实准确，但是，这些事情毕竟发生在几十年以前，年深日久，或有遗忘；或由于个人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地位的限制，对情况的了解可能不全，疏漏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当年东北抗联的战友和了解情况的同志提出批评、补正。

踏上革命征途

——烟筒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前后

一、寻找出路

一九一一年，我出生在辽宁省锦州市石山站镇关家窝棚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乡连年遭荒旱，生活无法维持，我七岁那年，父亲带着全家老小，逃荒来到吉林省扶余县三岔河镇。父亲和两个哥哥长年为人家作雇工，含辛茹苦劳动一年挣的工钱，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家庭的经济困难，使我们几个弟兄上学念书几乎成为不可能。还是由于我的力争，家里下了很大决心，才在我九岁那年送我上学读书，好歹念了三年，家庭经济每况愈下，不得不中途忍痛辍学，跟随母亲到别人的菜园子卖小工，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就成了家中的一个劳动力。

一九三一年，我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了，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我常想，象我这样一个不傻不痴的年轻壮汉，只要生活在这世，就应该干出点名堂，是骡子是马要拉出去溜溜才能见分晓，就这样寄人篱下，任人欺凌压榨，是不甘心的。也更不甘心一家人永远过那种穷

愁潦倒的生活。我曾几次试图挣脱出去都因为没有力量、没人支持失败了。这年秋天，我和本街弹棉花的失业工人郜福臣合伙，东挪西借凑了些钱，又拉了几个人，开了一个弹棉花的小作坊。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破船偏遇顶头风”，作坊开业不到两个月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入我国东北，一时兵荒马乱，闹得人心惶惶。我们弹出的棉花卖不出去，刚开张的小作坊就面临着穷途末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伪军投降了敌人，大批涌进三岔河，街里的店铺都住上了大兵。这些家伙，在敌人面前是“狗熊”，在群众面前却滥施淫威，作威作福，“打粳米，骂白面”，不给就抢，弄得群众怨声载道。我们的小作坊也不能幸免，被他们吃得一塌糊涂。我们几个人一看，再这样下去，就叫他们吃黄了，于是把作坊搬到了离铁路较远、受伪军干扰也少的榆树县南大新立屯。在那里也没有大的好转，不死不活的维持着，最后赔得连生活也维持不下去，才被迫“关门大吉”。一切善后事宜处理完了，已近年关，几个同伴都陆续回家过春节去了，我也不想回家，就一个人留在那里，看守着那两间空房子。

在这期间，我独自一人，空虚寂寞，百无聊赖，往日那些美好的幻想，一心展翅高飞的热情，渐渐地淡漠了、冷却了，常常在屋子里闷坐发愁。有一天，突然走进来一个人，我抬头一看，这是个青年，中等个头，脸胖胖的，长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穿一身蓝布棉袍，看上去朴实大方，还挺精神。这个人我在街上见过，但没搭

过话，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没等我说话，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叫曹国安，是我们对面小粮店掌柜的亲戚，从外地来的，在家没事，所以来看看我。正在孤独的时候，有人来看我，自然很高兴。那天他陪着我坐了老半天，和我拉家常，说东道西，也谈到当时社会上的情形，青年人的前途。在谈话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不抵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也很同情我的困境，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第一次接触，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人很热情，能关心人，又正直爽朗，所以很愿意和他接近，从那以后，他经常到我那里，和我谈天，我们之间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他比我大好几岁，我就叫他大哥。在和曹大哥的接触中，我明显地感到他知道很多事，懂很多我所知道的道理，是一位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他们占领东北，先把东三省变成殖民地，进而并吞整个中国。他以日本灭亡朝鲜为例，向我说明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的危险。我向他讨教，问他：“那我们怎么办？”他说：“中国人要想不当亡国奴，就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对付侵略者。”他还给我讲了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情况，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党，最关心、爱护老百姓。共产党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它领导的工农红军已经在江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我还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在东北也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们正在为解放东北人民而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

战。他讲的这些情况对我来说太新鲜了，不仅仅使我增加了许多知识，重要的是象给了我一把合用的钥匙，开启了我那郁闷了的心扉，教我明白了深刻的道理，使我心中升起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有骨气的中国人民，不会束手待毙，中国大有希望。

随着我们友谊的加深，我进一步了解到，曹国安同志原名叫于德俊，是吉林省永吉县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本侵略东北后，组织上把他派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我受到曹国安同志的影响很深，相信他远胜于相信他人，觉得跟他走，听他的话准不会错。当我决心参加革命、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之中时，他就介绍我参加了新立屯的抗日救国会。曹国安同志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他的指引下，我才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二、打入伪军

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一天，曹国安突然和我说起一件事，说他打听到在吉林省舒兰县乌拉街驻防的伪军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他提出要我和他一块去当伪军。这件事情提出的如此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对伪军是个什么货色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我想：那些伪军是最没出息的，手里拿着武器，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不但不抗日，反而投降日寇，为虎作伥，那还有一点民族的骨气？不要说让我去当伪军，就连听到伪军的名称都感到厌恶。我虽然非常尊重曹大哥，愿意听他的话，但这件事我是不能同意的。我很恳切地对曹国

安说：“曹大哥，咱们再没事干，也不能去当汉奸兵，干那种亡国奴的差事。”曹国安听后笑了起来，他耐心地给我解释说：“我让你和我去当兵并不是想去为敌人干事，而是为了深入到伪军里边做工作，瓦解他们。伪军也不是铁板一块，里边有不少有爱国思想、反对日本侵略的人。我们进去把这些人争取过来，等时机成熟就起义，连人带枪一起带出来，不就变成了我们的队伍了吗？”他这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就回答他说：“要是那样还行。曹大哥，我听你的，你走到哪我跟到哪。”曹国安见我思想通了，就又告诉我一些新的情况。他说，这个迫击炮连过去是东北军炮兵部队的一部分，曾驻在长春南岭。“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不愿向日军投降，曾经提出要求抗日，后因势单力弱，被吉林的大汉奸熙洽收编，派了汉奸吉兴的外甥赵某充任连长。从此，这个部队就成了为日本人效劳的工具。曹国安还说，那些有爱国心的士兵不会甘心跟坏蛋走，如果我们打进去，只要多对他们进行反帝爱国思想教育，一定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我们俩商量好以后，也不需要做什么复杂的准备，就一块去到乌拉街。找到迫击炮连驻地，只见连部门上插着个招兵的小旗，进进出出的人还真不少。到了报名处，一个当官的摆出一副很高傲、不屑一顾的神气，盘问了我俩的姓名、年龄和文化程度等，然后告诉我们，要当兵得有“保人”。这下子可把我们难住了，来到乌拉街，人生地不熟，上那去找“保人”？正在为难之时，真是巧极了，有一个当兵的从外边走进来，见到我就打招

呼：“三哥，你到这儿来干啥？”我一怔，心想是谁在叫我吗？仔细一看，果然是，是我家的邻居，姓卢。看见他真是喜出望外，眼前正缺熟人担保，来得正好！我问他：“卢老弟，你怎么穿上这身衣服了？”他说：“这年头兵荒马乱，在家也没事干，还不如出来当兵混碗饭吃。”我拉着曹国安对他说：“这是我的朋友，没法子，也想出来混碗饭吃。”接着我把找不到保人的情况向他说了，他一听很痛快地对我说：“你们愿意当兵好办，我就在迫击炮连第一排当兵，我给你们担保。”说着他就走进屋去，给我们报上了名，当即就算录用了，我俩都当上了一等兵，我被编到第一排，曹国安被编到第三排。我们就这样打入了迫击炮连，完成了预定计划的第一步。

三、秘密串连

我们第一排的排长名叫白连柱，是原东北军炮师团的老炮兵。据说他是迫击炮连唯一懂炮科技术的，但他却不识字，连个报表也写不了。我到排里以后，他发现我有点文化很高兴，经常叫我帮助他填写报表，写点简单的文字材料，如每个月枪枝弹药损坏、丢失的数目表报、领饷记账等。有时上边来公文、口令等，也让我念给他听。

连里对士兵的管理并不十分严格，我和曹国安同志差不多每天都能单独见面。他也还象从前一样，抓住一切机会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不断开导我、启发我，经常给我讲马列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讲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的革命斗争等情

况。在他的帮助下，我知道的革命道理逐渐多了，思想认识也随着有了很大提高。在我的思想里，开始萌生了入党的想法，也想象曹国安同志那样，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为革命多做些贡献。这个想法，最初我还不大敢提出，只是想以默默的工作去争取，后来才向曹国安同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出乎我的预料，曹国安同志对我提出的要求流露出满意的神情。他在进一步询问了我的入党动机和今后的打算后对我说：“只要做好工作，将来是会成为共产党员的。”他叫我在一排注意多团结一些人，和他们建立思想感情，要在士兵中树立起威信，取得大家的信任，同时注意掌握每个人的家庭历史、思想动态。对那些有明显反日爱国思想的人，更要多进行思想教育，多接近他们，先把可靠的人争取过来。曹国安同志没有用什么热烈的言词鼓励我，但却使我感到格外温暖、实在，倍受鼓舞，使我在向党靠近、向共产主义事业靠近的道路上缩短了距离。

按照曹国安同志的嘱咐，我在一排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我了解到士兵们都没有文化，不识字，绝大多数人出来就是为了混饭吃，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也有些老兵有反日情绪，不愿给鬼子干事。我就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情况，有的放矢地积极地进行争取工作。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谁有什么困难都给以帮助。如不厌其烦地给他们写家信，谁有点不舒服替他们站岗，耐心地说服一些人改变随便打人、骂人、拿人家东西等坏作风，使弟兄们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有什么事都愿意

跟我说。排里有些人虽然年龄比我大，但却都很尊重我，把我当成老大哥看待。我在排里的活动情况，经常向曹国安同志汇报，他不断地帮我分析情况，告诉我下一步该怎样做。三排的李排长也没有文化，曹国安同志在三排也同样受到器重。他的活动能力很强，办法比我多，工作比我做得好，把全排的多数人都团结起来了。

我们到伪军一个多月以后，一九三三年二月间，伪十四团全团移防到省城吉林市，迫击炮连也一同移防，驻在原东北军的“东大营”。这时曹国安和我商量，为了和更多的人接触，避免引起怀疑，商定了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家也容易接受的结拜“盟兄弟”的形式，联络更多的人。我们俩分头在一排和三排活动，很快就串连了二十多个可靠的人，利用一天早饭前的时间，到江沿的一个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在结拜时，大家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也绝不出卖朋友。结拜之后，按年龄大小排行，曹国安岁数最大，弟兄们就一致称他为老大哥。他也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弟兄们做嘱咐，借机会给大家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主张。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蹂躏着我们可爱的祖国，在这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时候，为不作奴隶，不当牛马，解放全中国，挽救全民族，大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要互相帮助。他说我当大哥的不会把弟兄们领到坏路上去。大家听了都很高兴，也很放心，从那以后，更加尊重他了。曹国安同志抓紧时机对有抗日思想的骨干分子进行爱国思想教育，经常给他们讲历

史上民族英雄反抗外侮的故事，宣传抗日救国的出路和光明前途，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一致对外的主张。他讲的这些内容，大家都口服心服，在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过了一段时间，曹国安同志又对我说，现在迫击炮连有我们两人工作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可是考虑将来起义，如能有机枪连的配合就更有利了。再说，起义成功后，队伍拉出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机关枪比迫击炮作用更大，因此应当抓紧时间做机关枪连的工作。他决定马上出去找一个人来，设法打进机关枪连。他编了一个探家的理由向排长请假，排长没有准假，他就直接给连长写了一个请假条。连长一看假条的语句和字写的都很好，看他挺有学问，就把他找到连部，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从事过什么职业。曹国安说他念过几年私塾，在中药铺当过学徒，还当过中医。连长准了他的假，告诉他说，连部还缺个“贴写”（即文书），等他“探家”回来，就不用回排里了，到连部当“贴写”。曹国安听了心里暗自高兴，不但出去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回来还可以捞个好差使，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曹国安同志回来领来一个名叫宋占祥（后改名孙铁岩）的人。他先把宋占祥安排住在旅馆里，然后就来找我，对我说：“宋占祥是咱们自己的人，这回安排他得你出力了，你和白排长关系挺好，求求他，就说宋占祥是你的表兄，让他给介绍到机关枪连去当兵”。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下来，事情办得格外顺利，找白排长一说

他就答应帮助安排。但是，这时机关枪连正在整编，还要减人，不招新兵。白排长这个人还真帮忙，他和我：“当兵在那还不行，还非得去机关枪连？就把你表兄补在迫击炮连吧。”既然机关枪连进不去，他主动答应给安排到迫击炮连，这是求之不得的事。白排长要把宋占祥安排到迫击炮连还有一点别的原因，原来二排长看到一、三排有我和曹国安给排长当帮手，很是羡慕，曾向白排长说过，要他帮助找一个有文化的新兵。这时，白排长问我：“你表兄有文化没有？”我告诉他不仅有文化，比我文化还高。就这样，宋占祥同志留在迫击炮连，被编到二排。机关枪连虽然没去上，第二排的空白却填补上了，有我们的人做工作了。从那以后，我们仨经常按约定的时间见面，交换情况，研究问题，工作开展得更好了。

机关枪连整编之后，又轮到了迫击炮连，几个有明显反日情绪的士兵被开除了，在士兵中引起了不安。我们几个就抓住这机会扩大宣传，加紧串连。我暗中对几个可靠的人说：“日本人不会相信咱们的，你们过去还抗过日，将来很可能有一天日本人把咱们全都收拾了。”士兵中对日本人的不满和仇恨情绪不断扩大，有的人明确表示不愿干了，认可上山去当土匪。这时曹国安同志又告诉我，现在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能轻举妄动，要进一步做思想工作，劝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时机，当土匪不是出路。如果有一天日本人真的动手来收拾我们，我们绝不能等着他们来缴械，和他们大干一场，然